

诗骚传统的现代转型

——以刘师培《南北文学不同论》为观察视角

吴寒

[摘要] 传统论述中，诗骚被表述为一元的源流关系。时至近代，刘师培《南北文学不同论》从地理环境决定论出发搭建南北文学叙事脉络，推动了“诗骚源流”向“诗骚南北”的现代转型。诗骚传统的古今之变，折射出文明意义上的“中国”转向民族国家意义上的“中国”的时代变迁。诗骚从普遍性的价值标杆，转而作为南北两大地域文学传统的代表，呼唤起人们对于中国文学多元的“本土特色”的思考与体认。但刘师培在“分南北”的同时，以“宗北”方式保证北方作为华夏文明起源之地的正统性，从而在二元结构中保留了统一的价值标准，在以“文学”方式建立民族国家的时空想象时坚守某种价值秩序，其背后的问题意识仍然值得省思。

[关键词] 诗骚传统；刘师培；一元同宗；二元格局；宗北

一、问题的提出

《诗经》和楚辞并称“诗骚”，作为诗赋之宗祖，历来受到尊崇。这一言志抒情的古典诗学传统，是现代“纯文学”观念的重要理论基础。^① 传统论述中，《诗经》为六经之一，楚辞为集部之首，诗骚被表述为源与流的关系。诗骚并非天然得以并称，相较《诗经》这样一个“原生型典范”，产生于战国的楚辞则是“次生型典范”。汉代至南朝，对二者关系的讨论，贯穿了楚辞的经典化历程。^② 学者们借由诗骚关系的探讨，意在提炼绳墨一切文艺创作的普遍性原则。不过，确保《诗经》的源

作者：吴寒，国家图书馆古籍馆副研究馆员，whan@nlc.cn。

*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诗经图像文献整理与研究”（19CZW010）阶段性成果。日本明海大学夏雨讲师为本文日语文献的翻译提供了帮助，匿名审稿人提供了专业细致的审稿意见，在此谨致谢忱。文责自负。

① 传统论“文”的进路主要有二，一是法度层面的文章、文体论，二是发生层面的“诗言志”理论。后者所代表的古典诗学传统，指涉的并非文体分类中狭义的“诗歌”，而是关乎人如何表达内心情志的基本文艺原理。古典诗学传统是近代以来以审美精神建构启蒙主体的重要理论资源，本文所讨论的传统“文学”也主要基于这一诗学进路。

② 《史记》引《离骚传》言：“《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矣……其称文小而其指极大，举类迩而见义远。”（司马迁：《史记》，2482页，中华书局，1982）从“词”“义”两方面肯定了诗骚间的继承关系，奠定了日后楚辞评论的主流基调。不过，此论以《诗经》为标杆肯定了楚辞的价值，却无意暗示楚辞在整个学术体系中具有“别子为宗”的性质。而《汉书·艺文志》言：“春秋之后，周道浸坏，聘问歌咏不行于列国，学《诗》之士逸在布衣，而贤人失志之赋作矣。大儒孙卿及楚臣屈原离谗忧国，皆作赋以风，咸有恻隐古诗之义。其后宋玉、唐勒，汉兴枚乘、司马相如，下及扬子云，竟为侈丽闳衍之词，没其风谕之义。是以扬子悔之，曰：‘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班固：《汉书》，1756页，中华书局，1962）在《汉志》描摹的“赋诗言志—诗人之赋—辞人之赋”学术史语境中，屈原上承周代“称诗谕志”之公共表达传统，在私人著述中仍不乏“风谕之义”；下启战国至两汉追求侈丽闳衍之辞赋创作，却与其后的“丽以淫”形成鲜明对比。如果说《史记》以《诗经》为标杆揭示了楚辞的意义，那么《汉志》则让楚辞在《诗经》这个既有典范的基础上，引领“丽”这一审美品格，将文艺创作原则进一步丰满。这是诗骚传统得以成立的理论基础。

头、主导地位是“同祖风、骚”^①的前提，典范背后的价值标准从根本上是一元的。当然，“诗骚源流”并不意味着楚辞完全被刻板地压制在宗经的樊笼之内，其“弘博丽雅”^②的特色仍被古人所推崇。但推崇有其章法，楚辞之“文胜”的价值及限度须借以《诗经》的标杆才能被理解与定位。《诗经》为“大宗”，楚辞为“小宗”。因此，虽然楚辞毫无疑问受到楚地“江山之助”^③，因“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④而带有强烈地方特征，传统文论中亦多有以地理论诗骚的内容，但相较于关注“普遍性”的创作论来说，着眼“特殊性”的地域风格论则是次一等的问題。^⑤

而近代以来，诗骚作为南北两大地域传统之代表，被树立为中国文学的基础性典范。综观20世纪文学研究，围绕诗骚关系衍生出“质实与虚无”“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理性与情感”等理论维度，并借由溯源式探讨辐射至整体文学史的理论建构。而这些话语体系之发轫，皆依托于南北分野所天然框定的二元格局。对文学宗祖的追溯与定位，寻找的并非最古老的“时间源头”，而是塑造中国文学核心气质的“精神典范”。因此，从“同祖风骚”到“诗骚南北”论，从一元的宗经辨骚到二元的分庭抗礼，不仅仅是对两部文学经典的重新定位，更是关乎中国文学史本源叙事的重要范式转型。

刘师培《南北文学不同论》是这一转型中的重要文献，其将诗骚置于南北地理格局中加以观照，分别视为早期南北文学代表，开中国学者论“诗骚南北”之先河。在这个贯穿历史的南北文学框架中，针对诗骚关系的改造是最具颠覆性，亦产生最大影响的一环。但刘师培在“分南北”的同时“以北为宗”，这种认识却没有在之后的诗骚论中延续。诗骚传统的现代转型是如何发生的？刘师培为什么要以南北格局观照中国文学？又为何秉持“宗北”立场？本文拟从这些思考出发，厘清刘师培思想中“分南北”与“宗北”两重旨趣，并以此为视角审视诗骚传统的“古今之变”。

二、刘师培与诗骚传统的古今之变

近代以来，传统以六经为基础的价值体系被现代学科体系所取代。在20世纪初的众多文学史著中，诗骚仍位列中国文学的源头性典范，却被离析为南北两大地域文学传统的代表，地理环境之别天然造就了两种不同的风格与形态。诗骚传统的现代转型意味着对文学基础性典范的重新发现与阐释，是关乎如何定位中国文学传统的重要理论问题。

在中国现代学术界，最早系统论述南北文学二元格局者当属刘师培。《南北文学不同论》发表于1905年，是《南北学派不同论》系列文章之一。^⑥在这组文章中，刘师培以黄河流域为北方，“山国之地，地土瘠瘠，阻于交通”，民尚实际；长江流域为南方，“泽国之地，土壤膏腴，便于交通”，民尚虚无。南北学术之别皆由地理环境引发的民性差异而来。具体到文学，则北方之文质实平易，“不外记事析理二端”，南方之文虚无骋辞，“或为言志抒情之体”。诗骚也被置于南北格局中予以观照，被赋予“北方之文”“南方之文”的身份：

① 沈约：《宋书》，1778页，中华书局，1974。

② 班固：《离骚序》，载洪兴祖：《楚辞补注》，50页，中华书局，1983。

③ 刘勰著，黄叔琳注，李详补注，杨明照校注拾遗：《增订文心雕龙校注》，567页，中华书局，2000。

④ 黄伯思：《校订楚词序》，载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第156册，166页，上海辞书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

⑤ 《文心雕龙》前五篇《原道》《征圣》《宗经》《正纬》《辨骚》，被刘勰视为“文之枢纽”。《辨骚》篇将楚辞总结为“虽取熔经意，亦自铸伟辞”。（刘勰著，黄叔琳注，李详补注，杨明照校注拾遗：《增订文心雕龙校注》，51页，中华书局，2000）在《物色》篇中刘勰谈及楚辞的地域色彩：“然屈平所以能洞监风骚之情者，抑亦江山之助乎！”（刘勰著，黄叔琳注，李详补注，杨明照校注拾遗：《增订文心雕龙校注》，567页，中华书局，2000）这说明刘勰注意到了楚辞形成的地理因素，但未将其视作最关键的文艺原理问题。

⑥ 刘师培：《南北学派不同论》，载《国粹学报》，1905（2，6，7，9）。《南北学派不同论》包括总论、诸子学、经学、理学、考证学、文学六个部分，后文所引刘师培言论皆出自此篇，为行文简练，不再一一注释。

雅、颂之诗，起于岐丰，而《国风》十五，太师所采，亦得之河、济之间。故讽咏遗篇，大抵治世之诗，从容揄扬；衰世之诗，悲哀刚劲；记事之什，雅近典谟。北方之文，莫之或先矣。

屈平之文，音涉哀思，矢耿介，慕灵修，芳草美人，托词喻物，志洁行芳，符于二南之比兴。而叙事纪游，遗尘超物，荒唐谲怪，复与庄、列相同。南方之文，此其选矣。

在刘师培搭建的南北文学叙事脉络中，诗骚从“群经一诸子”^①式的叙事框架中脱颖而出，成为早期南北文学之代表。《诗经》主体部分呈现的质实风格，为北方文学之高峰，而楚辞“以虚词喻实义”，代表早期南方最高水平。虽然刘师培并未直接提出“诗骚南北”论，但从地理出发区分诗骚引领的不同风格流派，已颠覆传统诗骚论的立论基础。作为早期南北文学代表的《诗经》和楚辞，不再是超越时间、空间，具备普遍性和一体性的文学典范，而是由特定地域、特定国民精神所生发出的特殊文学现象。从地理环境决定论出发，一元的宗经辨骚转化为各自为政的二元传统，是这一推论的自然走向。

传统论述中，孔子删述三代典籍而成六经，是对三代政教实践的原理化提炼。六经作为最早的文本经典，承载着华夏文明的精神旨归和价值根基。^②六经之中，《诗》以言志，“诗”非指狭义的体裁形式，而是关乎人的内在情志应该如何表达的基本命题和普遍原理。楚辞作为“发愤抒情”之作，其评价自然要汇聚到“诗言志”这一基础坐标，在诗骚的对照与互动中，楚辞之“丽”被凸显出来，从古诗中获得“则”的约束力量，从而被肯定、提升为抽象的审美维度。^③不过，“丽以则”仍在“诗言志”之内展开，辞赋创作传统也无法脱离原初的诗学传统，“诗人之赋丽以则”“赋者，古诗之流”^④不是单纯针对两类体裁或两个文本的源流分判，它意味着从一种普遍性原理中生发出了更丰富、宽广的理论层次，并借由诗骚获得了具体的文本形象。

而当刘师培借助地理视角，将北方之文总结为“记事析理”，南方之文总结为“言志抒情”，再以《诗经》和楚辞分别作为南北代表，《诗经》就不再是作为整体的《诗经》，而是主要产生于中国北方的“诗三百”。楚辞的意义自然不再需要来自《诗经》，它是中国南方地理环境的产物。楚辞驰骋文辞的语言风格，托物譬喻的艺术手法，在传统文论中被提炼为“丽”与“深”^⑤，它们经由《诗经》这个价值坐标的校准，上升为公共性的文论标准。但在《南北文学不同论》中，楚辞“以虚词喻实义”被归于“虚无”的风格判断，由泽国交通所孕育的虚无民性所奠定。“南方之地，水势浩洋，民生其际，多尚虚无”与“北方之地，土厚水深，民生其间，多尚实际”天然分属两个阵营。环境差异造就的两种地域特性，贯穿了从古到今的文学发展脉络。看起来，“质实”和“虚无”作为两种“客观”描述，取消了原本“诗骚源流”格局中的价值层级，但实际上，地理决定论的话语模式中仍隐含着价值立场：每种特殊的文学现象，都必须置于它所产生的特定时间、空间中才能被理解与定位。在对诗骚这一源头性典范的重塑中，二元空间结构“架空”了一元精神坐标。地理

① 《南北文学不同论》的早期文学史叙事，从时间和逻辑线索上遵循了“群经一诸子”的叙述框架，以“中国古籍，以六艺为最先”和“春秋以降，诸子并兴”分别领起一时代之文学。这也是较早一批文学史共同采取的叙事模式。

② 参见张志强：《“三代”与中国文明政教传统的形成》，载《文化纵横》，2019（6）。

③ 《史记》将楚辞语言风格总结为“文约辞微”，烘托其委婉劝讽的诗教精神，而对其辞藻华丽之审美特色关注较少。而《汉志》点出楚辞“丽”之特性，一方面，楚辞弘博丽雅堪当辞赋宗祖；另一方面，内在的“风喻之义”始终约束着外在文辞的“丽”。两者结合而成的“丽以则”，正是楚辞继承《诗经》而别开生面之处。长期以来，学者对“丽”的态度颇为审慎，它是在从古诗获得“则”的约束力量之后，才真正提升为正面的创作标准。而《汉志》以楚辞落实了“丽以则”的具体文本形态，自此以后，楚辞才作为“丽”的典型形象成为辞赋宗祖。

④ 班固：《两都赋序》，载萧统编，李善注：《文选》，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

⑤ 对于楚辞审美风格的总结，“丽”出自《汉书·艺文志》，主要关注其骋辞铺叙、辞藻华丽的语言特点。而“深”出自扬雄：“赋莫深于《离骚》。”（班固：《汉书》，3583页，中华书局，1962）主要关乎其托物譬喻、委婉曲折所形成的深远之致。

决定论作为更高的普遍性，取代了“诗言志”这一普遍原理。

南北文学论古已有之，从中国历史的长期演进来看，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由于气候、环境、政治等原因，在文化上确实表现出诸多差异。《北史·文苑传》提出“南文北质”之说：“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词义贞刚，重乎气质。”^① 形成后世讨论南北文学的重要理论模式。但在文明论视野下，要将南北方多元的文化识别为一个内在凝聚的整体，那么它们就必须有一个共同的价值核心。这个“精神源头”超越于地理的南北分野，它保证了不管在演进中产生了多么丰富多元的形态，华夏文明仍然是一个文化共同体。因此，《北史》中的南北文学格局限于对某一特定历史时期的描述，南北之优劣判断取决于谁更好地接续了文化正统的精神，二元空间格局仍由一元的源流关系所收摄。^② 这样的南北文学论不可能上通《诗经》与楚辞。从这个意义上，刘师培通贯古今的南北文学架构，最根本、也最具颠覆性的一环，就是针对文学史源头部分的改造。当群经与诸子在南北结构中各归各位，就意味着一元的“精神源头”不复存在。当《诗经》和楚辞分别成为早期南北文学的代表，由“诗言志”维系的坐标也宣告瓦解，中国文学被描述为从始至终的二元演进线索。

从地理决定论出发区判中国文学的南北二元演进传统，此种理论视角并非刘师培独创，彼时日本学界曾一度流行“中国南北不同论”。^③ 1893年冈仓天心来华旅行，回国后发文专论中国南北文化之区别，提出中国“没有一定的通性”，和欧洲一样是多元政治的合体。^④ 他由地理差异出发，以中国南方为“江边”文化，北方为“河边”文化，具体到文学上，北方平原旷野之文学规模宏大，却缺乏南方泽国的情致幽远：

《诗经》中没有楚诗，没有吴诗。而楚辞的幽怨，开始抒发江民们楚云湘水的南情，与河诗的趣旨不同，这不应该归为时代的差异。^⑤

冈仓天心已涉及诗骚地域分判，但止于只言片语，理论结构尚不明确。1897年藤田丰八《先秦文学》系统搭建南北文学框架，他认为中国北方严酷单调的地理环境造就了务实、崇古的国民性，南方优裕的环境孕育了理想性的文化。文学上，以六经为代表的三代文学兴起于北方，周末则出现了以孔子为代表的北方文学和以老子为代表的南方文学。在对屈原的定位上，藤田丰八反对“赋者，古诗之流”之说，认为以楚辞为代表的辞赋是南方产物：

古代的诗是和音乐一起歌咏的，南音的调未必和北音的调相合，北方古代的诗没有楚风就是这个原因……但赋为六义之一，人们认为《诗经》应是所有诗的本源，所以会陷入南方的赋发源于北方的诗这样的误谬。^⑥

藤田丰八从地理决定论出发搭建起先秦文学的基础框架，将楚辞从《诗经》的解释框架中独立出来，与南方的地理环境和学术传统相系联。不过，《先秦文学》中的南北架构主要围绕“孔北老南”展开，在“地理—民性—学派”的论述模式下，北方儒学与南方道家所造就的文化心理之差异，被视为形成南北不同文风的基础。三代以下，北方文学的代表是孔子、孟子、荀子，而南方文学的代表是老子、庄子、列子、屈原。“学”对“文”的笼罩，使得楚辞在文学史中较为边缘，诗

① 李延寿：《北史》，2781—2782页，中华书局，1974。

② 参见吴键：《“文质”与“南北”：刘师培〈南北文学不同论〉探析》，载《文艺理论研究》，2015（6）。

③ 参见陈广宏：《中国文学史之成立》，91—11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

④ 冈仓天心：《支那南北的区别》，载日本美术院编：《天心全集》，53页，日本美术院，1922。相关讨论参考村田雄二郎：《冈仓天心的中国南北异同论》，载《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4）。

⑤ 冈仓天心：《支那南北的区别》，载日本美术院编：《天心全集》，58页，日本美术院，1922。

⑥ 藤田丰八：《支那文学史稿·先秦文学》，150页，东华堂，1897。

骚亦非“先秦文学”的讨论重心。“孔北老南”之说清晰简易，为日本众多“中国文学史”沿用，成为一时潮流。

作为一种理论视角的“南北地理论”，很快引起中国学界关注。梁启超从1902年起发表《中国地理大势论》等文章，以南北二元架构分析中国文化发展变迁。而刘师培《南北学派不同论》系列文章将南北视角贯彻于诸子学、经学、理学、考据学、文学发展脉络，在“文”“学”分离的视域下，“孔北老南”的学理差异被归入《南北诸子学不同论》一篇，《南北文学不同论》则专注讨论南北文学风格、体式、流派之不同。此文向学界全面推介了以南北地理剖析文学发展脉络的研究方式。沿着这一理论线索，《诗经》和楚辞的意义从早期文学史中凸显出来，作为南北文学之代表，推动了“诗骚南北”话语模式的成型。

刘师培自述其认知方法渊源自德国学者那特砮（Karl Rathgen）的《政治学》。^①刘氏将南北地理差异总结为“山国”与“泽国”之区别：“山国之地，地土瘠瘠，阻于交通，故民之生其间者，崇尚实际，修身力行，有坚忍不拔之风。泽国之地，土壤膏腴，便于交通，故民之生其间者，崇尚虚无，活泼进取，有遗世特立之风。”此论贯穿《南北学派不同论》诸篇，为刘师培南北论之枢纽，其自注称：“此说本之那特砮《政治学》诸书。”《政治学》是那氏1882到1890年受聘于东京大学时的讲义，1902年广智书局和商务印书馆各自发行中译本，其中广智书局版由章太炎为其润色。^②《政治学》首章分析国家产生之“自然要素”，指出不同地形会塑造不同的国民性质：“生山谷者，其自由之精神坚忍而不拔。生海滨者，其自由之精神锐进而易化”^③。刘师培所论应本于此。不过其将“山谷”和“海滨”化为“山国”与“泽国”，并分别引领“踏实”与“蹈虚”两种品质，则与那氏之论异趣，应参考了传统说法。清王鸣盛言“南人虚夸诞妄”“北人沈潜笃实”^④。江藩言：“北人质直好义，身体力行；南人习尚浮夸，好腾口说。其弊流于释、老，甚至援儒入佛。”^⑤江藩诸人从学风层面论“南虚北实”，一些表述为刘师培所沿用。此外值得注意的是，1904年章太炎《廛书》重订本出版，新增《方言》篇从音声出发勾勒了南北语音发展变迁、优势消长的历史脉络。比较章、刘南北论，不难发现二者在南北音声差异、交通地位变迁诸论上的承袭与呼应之处，刘师培很可能也受到了来自章太炎的影响。^⑥

① 虽然在刘师培以前，明治时期的日本学者已经受到欧洲国别文学史影响，尝试搭建中国南北文学的理论架构，其中笹川种郎之著于1903年出版中译本。但从刘氏自述及其这一时期的论著来看，他似乎并未直接参考日人中国文学史著的理论成果。从对南北地域风格的具体论述看，冈仓天心以北方为平原，南方为泽国；藤田丰八认为北方环境严酷，南方自然条件优裕，这与刘师培“北方山国，南方泽国”的理论架构颇有差异。而“山国之民性格坚韧，故其学风质实”这一判断，在刘师培南北论中非常关键，刘师培关于“地理环境决定论”的论述主要参考的应该就是那特砮《政治学》一书。

② 参见孙宏云：《那特砮的〈政治学〉及其在晚清的译介》，载《中华文史论丛》，2011（3）。

③ 那特砮：《政治学》，5页，广智书局，1903。

④ 王鸣盛：《蛾术编》，载陈文和主编：《嘉定王鸣盛全集》第7册，35页，中华书局，2010。

⑤ 江藩：《汉学师承记 宋学渊源记》，164页，上海书店，1983。《南北理学不同论》言：“南方之学术皆老释之别派……岂非南方之地民习浮夸，好腾口说，固与北人之身体力行者殊哉？”明显承袭江藩之说。此外，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中，亦以“崇实”和“尚虚”作为南北差异之一，石川祯浩指出梁启超南北论应该受到了藤田丰八的影响，参见石川祯浩：《中国近代历史的表与里》，139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梁启超关于中国地理大势的系列文章在当时影响很大，刘师培“南虚北实”之论可能也参考了这些成果。

⑥ 例如，章太炎以音声为基础讨论南北差异，认为宋以后北方水道淤塞，南方交通地位凸显，从而南方文化崛起。（章太炎：《方言》，载上海人民出版社编：《章太炎全集·第一辑·廛书（重订本）》，204-208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这些思考都为刘师培所继承。而刘师培明确驳斥章氏“楚音为夏音”之论，这正是章氏论证南音正统性的关键环节，二者隐然呈现针锋相对之势。目前学界多关注梁启超、刘师培、王国维在南北文论中的先导之功，对于章太炎关注较少。章、刘南北论之比较，当是我们把握现代南北论发轫的重要理论关节。章氏《方言》篇中南北论的基本思路，是从语音角度论证南音的正统性，从而强调近代以来“北强于南”只是表象，并凸显南方汉民族文化的优势地位。而刘师培则引入“地理环境决定论”，从地理角度论证北方文化的正统性，继而强调永嘉南渡以来“南强于北”只是表象，作为汉民族兴起之地的北学才是中国文化的根脉所在。虽然二人一宗南，一宗北，但立场与论证结构却有相似性。不过这并非本文重心，容另文详谈。

刘师培较早引进域外理论资源,并发展了相关传统理论表述,系统搭建出中国文学的南北叙事,在这一话题领域有先驱意义。“诗骚南北”论迅速被文学史著所接受,形成一种被广泛接受的公共认知模式。在林传甲于1904年为京师大学堂国文课程编著的讲义中,诗骚尚被归于群经到诸子的演进脉络。而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文学史著中,“诗骚南北”已取代“诗骚源流”论,成为中国文学源头部分的主流叙事。如郑振铎《文学大纲》言:“我们现在所能得到的中国古代的伟大的文学作品只有两部:一部是《诗经》,一部是《楚辞》。”“《诗经》所选录的都是北方的诗歌,《楚辞》所选录的则都是南方的诗歌。”^①胡怀琛说:“《国风》为北方之诗派,而《楚辞》则南方之诗派也。”^②胡云翼说:“《诗》是以黄河为中心,代表北方民族性的文学,《楚辞》是以长江为中心,代表南方民族性的文学。”^③谢无量将诗骚数百年的时间差模糊处理为“较早”和“较迟”,从而把二者拉到同一层面比较:“中国学术,在春秋战国之时,隐隐就有南北两派。文学上也是一样,不过北方文学发达较早,南方文学发达较迟。”^④他激烈批判“诗骚源流”论:“诗经和楚词是不同的,南方文学的思想和北方文学的思想是不同的。他们各有他们的历史,各有他们的环境,是不能并为一谈的。后来批评注释楚词的人,或者用北方的思想来解释他,或者用诗经的精神来范围他,岂不错了。”^⑤随着学理视角的转换,围绕“诗骚南北”的一系列理论建设也随之展开,学者们从句式、用字、篇幅、风格、内容、情感倾向等方面,比较《诗经》和楚辞的差异之处,并从早期文献中搜寻楚地歌谣的蛛丝马迹,搭建起楚辞的楚地渊源谱系,以丰满两种不同的地域文学传统。

“诗骚南北”论更是作为诗骚二元结构的理论基础,衍生出丰富的理论维度。在20世纪文学史叙事中一直以各种“变体”的形态,活跃于文学史源头叙事。20世纪60年代,游国恩等主编《中国文学史》中说:“《诗经》和楚辞所开辟的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创作道路,二千年来一直为我国优秀的作家所继承和发扬。”^⑥80年代,李泽厚《美的历程》谈道,“当理性精神在北中国节节胜利”,南方“仍然弥漫在一片奇异想像和炽烈情感的图腾”,这就是以屈原为代表的楚文化。^⑦从各时期的代表性话语模式中,我们都可以隐隐找到“诗骚南北”论的影子。

三、“宗北”与刘师培理论的复杂性

当《诗经》和楚辞被赋予“中国北方”和“中国南方”的身份,诗骚传统也就从一元的价值典范,分离为二元的“地方性知识”,这是诗骚现代转型的关节所在,它从根源上改变了文学史脉络的组织方式。这背后折射的是,文明意义上的“中国”转向民族国家意义上的“中国”,成为我们认识自身的新方式。作为六经之一的《诗经》走下神坛,其所维系的儒家诗学传统也丧失了普遍文艺原理的地位。传统围绕“诗言志”的理论建设,寻求的是解释、约束一切情感生发活动的普遍性,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它不是作为一种喜好或倾向被提出,而是作为一个价值准则被树立起来。而当中国成为一个民族国家,“诗言志”的普遍性效力就被大大削弱了,它需要以他者为标尺,阐发自身作为一个特殊文艺主张的“特殊性”所在。在民族国家的视野之下,通过文学史的叙事脉络,激发人们对于祖国的认同,是“文学”在这一历史时期承担的重要任务。此时的“中国文学”与塑造国族想象密切相关,“故言民族之精神,则以知民族之历史与其土地之关系为第一义,而后

① 郑振铎:《文学大纲》,130、144页,商务印书馆,2015。

② 胡怀琛:《中国文学史略》,19页,梁溪图书馆,1924。

③ 胡云翼:《中国文学概论》,68页,启智书局,1934。

④⑤ 谢无量:《楚词新论》,1、11页,商务印书馆,1923。

⑥ 游国恩等主编:《中国文学史》第1册,108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

⑦ 李泽厚:《美的历程》,69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

可以进而言生存竞争之理”^①。《诗经》和楚辞作为“南北”两大地域文学传统的代表，呼唤起人们对于中国文学多元的“本土特色”的想象与体认。诗骚代表的两种性格要素相结合，便凝聚为中国文学区别于世界其他民族文学的特质。从诗骚传统重新出发，文学史成为回答“什么是中国”的重要方式，20世纪二三十年代文学史著的大量创作正是这一时代思潮的产物。

但问题也随之而来，《诗经》代表的北方传统和楚辞引领的南方传统之间是什么关系？各自生成、各具特色的二元传统如何被识别为一个足为中国文学范式的“整体”？仅以“互补”“拼合”何以诠释中国文学传统的基本精神？郑振铎《文学大纲》以“《诗经》和《楚辞》”对标希腊神话、印度史诗等，《诗经》是“民间的歌谣与征夫或忧时者及关心当时政治与社会的扰乱者的叹声与愤歌”，而楚辞“是诗人的创作，是诗人的理想的产品”^②。由此形成中国为抒情诗，西方为史诗或戏剧的认识模式。这一认识模式延续在20世纪诸多文学史著中，由《诗经》探讨“民间文学”与“集体创作”，由楚辞分析“诗人创作”和“浪漫想象”，成为文学史的惯常写作思路。1971年陈世骧在演讲中将中国文学总结为“抒情传统”：

歌——或曰：言辞乐章（word-music）所具备的形式结构，以及在内容或意向上表现出来的主体性和自抒胸臆（self-expression），是定义抒情诗的两大基本要素。《诗经》和《楚辞》，作为中国文学传统的源头，把这两项要素结合起来，只是两要素之主从位置或有差异。自此，中国文学创作的主要航道确定下来了，尽管往后这个传统不断发展与扩张。可以这样说，从此以后，中国文学注定要以抒情为主导。抒情精神（lyricism）成就了中国的文学的荣耀，也造成它的局限。^③

陈世骧将音乐性的形式结构（word-music）和自我表达的内容意向（self-expression）作为抒情诗的两大要素，以“和音乐密不可分，兼且个人化语调充盈其间”的《诗经》，和“以与自我直接关涉的方式呈示意象”从而“代表了抒情的另一个主要方向”的楚辞作为源头代表，并将这个“东方抒情传统”与“欧西史诗及戏剧传统”相互映照而突显。^④但他并没有说明抒情诗两大要素之间的关系。而在这篇演讲中他又提道：“对于孔子来说，诗的目的不在于‘言志’，在于倾吐心中的欲望、意向或者怀抱，故此其重点就是情感上的自抒胸臆，而这正是抒情诗的标志。”^⑤由这一判断出发，则“抒情诗”之形式与内容两大要素，关键仍落在自我表达上，那么“诗言志”最佳的诠释文本不是《诗经》而是楚辞，这显然并非陈世骧所希望引出的结论。陈氏此论提出之后，于海内外学界嗣响不绝，批评其“以西律中”者亦不在少数。以“抒情”拨动“诗言志”这一传统诗学的核心命题，从而激活中国古代文论传统，这一问题意识继承了近代以来以审美主体塑造国民精神的启蒙言路，是其论切中时代脉搏之处。但诗骚关系的内在逻辑，仍是这个“抒情传统”难以回答的问题。一个由双重特质叠加、拼合而成的“抒情传统”，可以构成对外的“身份名片”，却难以凝聚起对内的“自我认知”。对此我们只能说，它在某种意义上更像是一个外在于自我的想象。

由现代诗骚传统展开的思考，促使我们再次回到转型期的关键人物刘师培。刘师培较早引入以南北二元视角审视、重构中国文学传统，是诗骚传统转型中的先驱人物。但在“分南北”的同时，他却更偏向《诗经》所代表的北方传统，“宗北”倾向贯穿于《南北学派不同论》系列文章，似乎是其理论“保守”的一面。但也正是以“宗北”的方式，刘师培保证了北方作为华夏文明起源之地的正统性，从而在二元结构中保留了一元的价值标准。这提示我们，作为一个接受了完整旧学教育

① 《民族精神论》，载《江苏》，1903（7）。

② 郑振铎：《文学大纲》，157页，商务印书馆，2015。

③④⑤ 陈世骧：《中国文学的抒情传统》，5、4-6、7-8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

的学者，刘师培对自身文化传统抱有深切感情，相较“五四”一代学者，其态度更多呈现出新旧间的复杂性，也恰恰是这种复杂性中，蕴涵了转型期思想更丰富的可能性。若仅以“进步”与“局限”裁割其理论的各个面向，未免陷于成见而难以窥见刘师培此论背后的时代关怀，亦失去真正理解和激活其思想资源的机会。

刘师培于1903年改名“光汉”，《攘夷》《中国民族志》《南北学派不同论》等都作于这一时期。按照学界对刘师培“民族主义—无政府主义—保守主义”的阶段划分，此时正值其“民族主义”阶段，他最重要的思想关切，在于面对传统价值秩序受到冲击的时代变局，灵活利用各种文化资源，整顿文明的发展线索，重新回答“什么是中国”这个问题。而《南北文学不同论》即是这一问题在“文学”层面的回答。从地理环境对国民个性的影响出发，《南北文学不同论》描摹了一个因地域差异而表现出多元特色的中国文学传统，“北方质实”与“南方虚无”的地域特质贯彻古今，在“中国”的地理坐标内展开关于“文学”的空间想象。沿此理路，诗骚间的源流关系被颠覆，中国文学的南北框架逐渐聚焦于作为源头性典范的《诗经》和楚辞，开启了“诗骚南北”的理论走向。

但刘师培的南北文学论中还蕴含另一重关键的理论维度——“宗北”。这包括“应然”与“实然”两个方面。^①

“应然”层面，北方山国之地孕育的质实风格，从根本上优于南方泽国之地的蹈虚风格。地域与文风紧密绑定，奠定了北方天然的优势地位。《南北文学不同论》开篇褒扬从六经到北方诸子的质实风格，而南方则以老、庄、屈、宋为“荒唐谲怪”，纵横家为“喜腾口说”“以诡辩相高”，墨家为“浅察以衔词，纤巧以弄思”。从文学史源头处奠定“宗北”基调。欧阳修、曾巩之文取法韩愈，但其身为南人无法习得北方之神韵，不免平弱之讥：“岂非昌黎之文，固非南人所能效哉？”江西诗派以北人杜甫为宗，但雄浑气概远远不及：“虽逋峭坚凝，一洗凡艳，然雄厚之气，远逊杜、韩。岂非杜、韩之诗，亦非南人所克效与？”质实雄健的风格只能产生于北方地理环境，非南人学习所能致，此论颇有“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②之意味。“宗北”态度贯彻于“南北学派不同论”系列文章。在《南北理学不同论》中，刘师培批评南方“空谈心性”之学：“岂非南方之地，民习浮夸，好腾口说，固与北人之身体力行者殊哉？”又认为近世南方学者多主蹈虚之学，“惟徽、歙处万山之间，异于东南之泽国”，故其学仍有可观者，不同于南方泽国的主流气象，“与空谈心性者迥别”。在《南北考证学不同论》中，刘师培以“皖南多山”为由，将自己服膺的皖南学派从长江流域划归北学：“皖南多山，失交通之益，与江南殊，故所学亦与江南迥异。”在“宗北”的价值理想之下，皖南学派只有作为一种“北学”，才有资格列为学术正统。

而“实然”层面，北方文学虽有天然优势特质，但由于政治原因，汉族南迁后质实文风逐渐无人继承，导致北方创作实践反而落后于南方。在《南北学派不同论》总论中，刘师培开宗明义地谈到，自己思考南北框架的出发点在于二者优势地位的转变：“三代之时，学术兴于北方，而大江以南无学。魏晋以后，南方之学术日昌，致北方学者，反瞠乎其后者。其何故哉？”他认为造成转变的原因是永嘉南渡后北方“民习于夷”，汉室南迁，“流风所被，文化日滋”。《南北文学不同论》勾勒了北方质实文风的“失坠”过程，将关键节点定于魏晋：“魏、晋之际，文体变迁，而北方之士，侈效南文……北方文体，至此始淆。”北方之士竞相学习南方文风，导致文坛被轻绮纤弱风气笼罩，

^① 吴键指出，在刘师培南北论中，“南北”分野作为文学史的先在框架，不仅是一种历史性的“实然”，同时也成为了一种理论性的“应然”，参见吴键：《“文质”与“南北”：刘师培〈南北文学不同论〉探析》，载《文艺理论研究》，2015（6）。不过，当引入“宗北”这一层理论旨趣，“实然”和“应然”两重维度恰恰是矛盾而非统一的。这也意味着，南方之强只是特定历史形势造就的“幻象”，北方之强才符合事理逻辑，也才是未来应该努力的方向。

^② 张纯一撰，梁运华点校：《晏子春秋校注》，290页，中华书局，2014。

只有刘琨、郭璞持守清刚、挺拔之声，“北方之文，赖以不坠”。至隋炀帝“一洗浮荡之言”，唐初诗文尽革“卑靡之音”，晚唐却再度“诗趋纤巧，拾六代之唾余”。而金元时期北方更是文风凋敝，仅赖元好问远宗杜甫，继承中州法度：“金、元宅夏，文藻黯然。惟遗山之诗，则法少陵，存中州之正声。”而经历了沦落、重振、再度沦落的历史进程，最终全文结束于对清季以降北方文脉断绝的慨叹：“然雄健之作，概乎其未闻也。故观乎人文，亦可以察时变矣。”刘师培在《南北经学不同论》文末也对北方经学的湮没痛心疾首：“及贞观定《五经义疏》，南学盛行而北学遂湮没不彰矣，悲夫！”

古代“北胜于南”，现在却“南胜于北”；应该“北胜于南”，实际则“南胜于北”。“古/今”与“应然/实然”两重矛盾交织，使得刘师培既在分南北的同时保持了内部“一元”的价值标准，又从这个价值标准生发出与“攘夷”的民族主义主张密切相关的强烈现实指向。在刘师培的语境中，“分南北”并不意味着中国是一个南北“互补”“拼合”的中国，南北分野中已经天然地包含了内在秩序。地理上的南北格局只是由特定的历史形势所造就，而从文明角度，与其说北方与南方，毋宁说是中原与南方。“宗北”意味着中国文学的主体和关键在于北方，这一判断与“北方之地，乃学术发源之区也”互为因果——北方地理环境必然造就优质文化，而这些优秀特质正是中国文化的固有属性。从这个意义上，中国文学的故事不论“时间源头”还是“精神正统”，都应从北方的六经讲起，“中国古籍，以六艺为最先”。而六经之中，《诗经》代表了北方文学成就的巅峰，“北方之文，莫之或先矣”。透过理论的层层聚焦，最终落点还是汇聚到了《诗经》。由此，刘师培在南北二元格局中依然试图保留《诗经》这个一元的精神典范。

对“分南北”与“宗北”两重维度的勾勒，使我们得窥刘师培南北论的复杂性所在。如果说诗骚传统的成立，从某种层面上反映了传统学术体系的内部的自我凝聚与理论深化，那么诗骚传统的现代转型，则是文明面对危机之时的理论调整。不论刘师培还是“五四”一代学者，他们引入域外理论资源皆非单纯为了摄取新知，而旨在立足自身文化立场应对现实问题。刘师培的意义，一方面在于他是最早以新的理论视角审视诗骚传统的中国学者；另一方面，则在于他意识到“分南北”背后的二元逻辑可能造成的一元价值失守，并试图以“宗北”的方式解决这个问题。

四、刘师培“南北论”背后的时代关怀

刘师培之后，“诗骚南北”论逐渐成形并被广泛接受，凝固为文学史叙事中的二元格局，而“宗北”的时代思考却未得到足够重视。刘师培以“宗北”方式，在民族国家的意义框架内保持文明论意义上的一元正统，在以“文学”编织民族国家的时空想象时保留某种价值秩序，其背后的问题意识仍然值得我们深思。《南北学派不同论》系列文章包括了文学、诸子学、经学、理学等等，这反映了刘师培考虑“中国”问题的统一性。“文学”是作为“中国”的一个面向出现的。那么，刘师培为何构建这样一个南北格局作为思考“中国”的基本框架？结合与两种“南北论”的比较，我们能体察其时代关怀所在。

一种是“地理”意义上的南北论。以冈仓天心、藤田丰八为代表的日本学者，提出与地理环境决定论密切相关的“中国南北不同论”。其论有两个重要指向：一是拆解中华文明的整体性，将中国的多元文化差异放到世界范围内予以类比和定位，以“世界”为理解中国提供尺度。冈仓天心认为中国和欧洲一样表现出多元特性，“日耳曼人种生活于高原风雪之地，勇敢刚直”，接近中国北方；“拉丁人种生活在地中海温暖地带，风流潇洒”，接近中国南方。^①藤田丰八将北方“务实”

^① 冈仓天心：《支那南北的区别》，载日本美术院编：《天心全集》，53页，日本美术院，1922。

“主情”看作中国文明固有性质，南方“务虚”“主智”则近似西方雅利安人种的特点，从而“东西”与“南北”交错，构成文学史叙事的两条线索。^①二是“重南轻北”，其实质是对作为华夏文明之大宗的儒学的否定。冈仓天心认为道家和禅宗体现南方个人主义倾向，与北方儒家集体主义形成鲜明对比。屈原的理想主义和北方“乏味的伦理道德观念大相径庭”^②。藤田丰八认为中国文化发源于北方汉人种间，特质为家长制、排他、崇古、重视血缘等等，“南方文学兴起，佛教传入，才补足文学中理想的欠缺”^③。北方儒学被贴上众多否定性标签，南方则被视为异质性、疗救性的因素。^④

石川禎浩指出，其时地理决定论之所以在中国学界迅速被接受，盖因其满足学界对“普遍性”的渴望，从中“不仅理解了各国的地名或风俗，而且发现了存在于地理与历史、地理与文明之间的人类历史‘公例’”^⑤。从纬度、地形出发比较中国和其他文明，也是刘师培南北论的一个重要视角。^⑥地理决定论蕴含的普遍性，构成了回答“什么是中国”的外在尺度，由此出发，理解文明内部多元性的标尺被寄托于中国之外的“世界”。但与冈仓天心等人“重南轻北”的态度截然相反，刘师培却“宗北轻南”，这反映了他所秉持的文化立场。对于刘师培而言，引入西方理论的根本目的在于为中华文明的内部调整提供理论资源，他仍坚定地视“学术发源之区”的北方为正统。

第二种是“文明”意义上的南北论，传统区判“南北”的历史论述尽管随时代发展经历了理论形态的内部调整，但在文明论视域下，文教“正统”始终作为价值尺度凌驾于南北格局之上。^⑦王夫之言：“吴、楚、闽、越，汉以前夷也，而今为文教之藪。齐、晋、燕、赵，唐、隋以前之中夏也，而今之椎钝駉戾者，十九而抱禽心矣。”^⑧南方由夷狄成为文教之藪，北方由文教正统变成禽兽之地，文教中心可以迁移消长，一元的价值原则支配着地理上的空间秩序，以此出发可以鉴别华夷、内外，判断文明发展程度的差异。刘师培在《南北学派不同论》开篇提出永嘉南渡以来的汉族迁徙是造成文化中心转移的关键因素，这一话语模式与王夫之非常相似。由这样一个华夷、文野对立的南北格局出发，可以树立中国内部汉民族的主体地位，呼应刘师培这一时期“攘夷”“排满”的民族主张，这构成了回答“什么是中国”的内部尺度。

但是，王、刘仍有关键差异。对王夫之而言，文化中心可以随汉室南渡转移到南方，确立文教正统的关键在“人”而不在“地”。但在刘师培从地理决定论出发的理解模式内，“人”“地”两重因素缺一不可。文化中心被牢牢限定于北方，地域特质不会改变，文化特质也不会改变，山国之质实天然优于泽国之蹈虚。永嘉南渡以来的南北消长，不是文化中心迁移到了北方，而是一方面，北方优势文化因为“民习于夷”而无人继承，走向沦落；另一方面，汉人南迁之后受南方风土影响逐渐丧失北学特质，“冠带之民萃居江表，流风所被，文化日滋”。因此，要想振兴华夏文明，在树立

① 参见陆胤：《明治日本的汉学论与近代“中国文学”学科之发端》，载《中华文史论丛》，2011（2）。

② 冈仓天心：《茶之书》，31页，北京出版社，2010。

③ 藤田丰八：《支那文学史稿·先秦文学》，8页，东华堂，1897。

④ 陈广宏指出，笹川种郎继承藤田丰八“重北轻南”的理论架构，并将其进一步推广至整个中国文学史的脉络。参见陈广宏：《中国文学史之成立》，10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

⑤ 石川禎浩：《中国近代历史的表与里》，139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

⑥ 例如，刘师培《南北理学不同论》以纬度解释中国与印度学术之关系：“中国南方之地，在赤道北二十度至三十度之间。印度北部亦然。故学术相近。”

⑦ 罗志田指出，传统“夷夏之辨”有封闭性与开放性两面，开放一面主要以文明区判夷夏，而封闭一面主要以产地疆域区分夷夏，这两种趋势依时代政治形势的发展而变化，而开放一面始终占据主流。参见罗志田：《民族主义与近代中国思想》，68-69页，东大图书公司，1998。

⑧ 王夫之：《思问录 俟解 黄书噩梦》，74页，中华书局，2009。

民族主体性的同时，还必须扎根土地，维系住中国的地理版图。

1894年内藤湖南发表《地势臆说》，由赵翼、顾祖禹等人的地理论进入，提出中国文化中心宋以后逐渐南移的观点，进而得出日本将取代中国成为新的坤舆文明之中心的结论，其“文化中心迁移说”对日本东洋史学界产生重大影响。这提示我们，在传统南北二元的正统之争中，“文化中心迁移说”虽可以较好地用以自我身份识别，但在晚清列强环伺的复杂争竞态势下，它也有其危险性。反观刘师培将文教正统限定于“北学”，否认了迁移的随意性，正是对这一问题的学理回应。可以说，从“文明体”的中国收缩凝聚为作为“民族国家”的中国，意味着一种文明面对危机时的“守势”，同时，以“民族国家”场域持守旧秩序失据后的关键价值，也体现了华夏文明的灵活性、坚韧性与独立性，避免它走向拆解和沦落。

刘师培南北论在“地理”与“文明”间独辟蹊径，蕴涵了与时代危机意识密切相关的深重关怀。他由此观照中国文学，推动了从“诗骚源流”到“诗骚南北”的现代转型。而暗藏于“分南北”之下的“宗北”倾向，也为我们展示了刘师培的深层次思考：如何在二元格局中凝聚起中国文学传统内部的价值秩序？如何在现代民族国家的叙事场域中兼容中华文明的内在整全性？从这个意义上，我们仍值得回顾刘师培的思索轨迹，从诗骚转型的“问题源头”再度出发。

Modern Transformation of the *Shi* and *Chuci* Tradition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iu Shippei's *Nanbei Wenxue Butong Lun*

WU Han

(Department of Ancient Books, Chinese National Library)

Abstract: In traditional discourses, *the Book of Songs* and the *Songs of Chu* were considered as different phases of the same tradition. Liu Shippei's *Nanbei Wenxue Butong Lun*, or *On Literary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North and the South*, points out the literary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north and the south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geographical determinism, and the *Book of Songs* and the *Songs of Chu* are thus understood as two different local traditions. This change reflects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China as a civilization to the China as a nation-state. The *Book of Songs* and the *Songs of Chu* inspire people's rethinking of the multi-dimensional nature of Chinese literature for the diverse local characteristics they represent. Be that as it may, Liu Shippei considers the northern tradition as the origin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and the reason beyond such recognition is worth exploring.

Key words: The *Shi* and the *Chuci* traditions; Liu Shippei; One single family; Dual pattern; Zongbei

(责任编辑 张 静)